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小传

赵 深

赵万里先生（1905—1980）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曾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赵万里先生字斐云，别署芸龠、舜龠等，浙江海宁人，1905年4月4日生于海宁啸园。啸园是著名陈阁老花园安澜园的一部分，虽荒废已久，当时仍有许多花木；在住房的屋前屋后，还有不少桃树和十多株枇杷树，这就培养了他对植物的浓厚兴趣和深深的爱好。从上小学时起，他到处采集植物，分类分目地制作标本；江南草木茂盛，逐年积累，他能识别许多植物，能随口说出其名称科目；他少年时制作的植物标本，积存达数百种，后来全部赠给海宁县中山中学（这所学校在抗战炮火中被夷为平地）。

入学以前，他在母亲教导下已认识了千余字，能背诵几十首唐诗。七岁进海宁达才小学读书，十分用功，成绩很好。上小学

时，他每天很早就去学校，这曾引起过祖父的怀疑。有一次祖父跟踪窥视，见他到校后正从缸中取水，磨墨习字。他少年时期的作文就十分出色，老师曾在他的作文“海宁观潮记”后，写了长篇批语，赞扬备至。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在校时用功学习，各科均列前茅，尤致力于中国文学和史学。有次在雨天的星期日，他向别人家借得一部《三国志》，高兴地捧书回家，足穿钉鞋，不意滑跌一跤，左边眉心碰破，但书却高高举着没有污损。一九二一年中学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曾从吴瞿安（梅）先生学习，研究词曲，颇有心得。他对词的创作爱好尤深，这期间填词很多，在家里常常绕着桌子边走边吟，反复推敲。后来研究转向戏曲，词也不多作了，保留的一些作品虽是“少作”，仍可见其造诣之深。

他在学生时代，生活十分节俭，把零用钱省下来买了书，每次回家都带回很多线装书，到后来他的卧房几乎成了小书库，书的积累日多，排列也井然有序，这些书后来在抗战时全部散失了。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拜王国维先生为师，以后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助教。他对王先生非常敬慕，执礼甚恭，王先生对这位高足，也是颇加青睐的，他曾临校王先生校本《水经注》，王先生在书上题了长跋。在王先生指导下，他学习刻苦专心，此后他在学术领域中涉及的面更广了，这时期在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版本等方面，都奠定了基础。王先生治学态度谨严，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使他深受熏陶；在以后几十年学术研究工作中，他一直保持着从严求实的态度。他从青年时起，写过和发表过的文章不下百余篇，整部著作的出版却是慎之又慎的，如《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早在1936年已定稿，又经一再补充修订，到1956年才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列入考古学专刊出版。他早年发表的论文，以《述遼方二字义》（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二期1923年8月）和《唐写本

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清华学报三卷一号1926年6月）两篇为较早。

1927年王先生自沉于昆明湖，当时他悲痛异常；这不仅是出于师生之谊的沉痛哀悼，更因为王先生的逝世实在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他编写了“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二卷五号、1927年4月）“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目录”（国学月报专号、二卷八、九、十号合刊、1927年10月）、“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年4月）。同时编辑王先生著作成《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28年出版。以后他离开清华国学研究院，到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北海图书馆工作，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在北京图书馆工作长达五十多年，解放前历任该馆编纂委员、购书委员会委员、善本部主任；建国后任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他到图书馆时，善本部主任是徐森玉先生。徐老是当代有名的版本学家、文物鉴定家，学识渊博，对金石、书画、目录、版本、以至陶瓷，无不精通。工作中他受徐老的指导，影响很大，加上北京图书馆丰富的善本书藏，遂日沉浸于宋元旧刻、名校精抄之间，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以过人的理解能力和记忆力，加之原来的治学基础，使他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有更深的造诣。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周叔弼、张允亮诸前辈，也都是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由于对古籍有共同的真知笃好，他与他们处于师友之间，互相切磋，把版本鉴定推向新的水平。

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图书馆工作之外，兼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通讯研究员，同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这期间还在北京几所大学中教课，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等职。1929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教课，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从1929年至1937年，1945年至195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33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33年至1951年在

辅仁大学任教。1942年至1945年在中国大学任教。他在上述各大学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板史、中国戏曲史、中国俗文学、词史等课程。

在烦忙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仍将图书馆工作视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对馆藏古籍善本进行整理编目，编出《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1933年刻版印行。同时开展了《永乐大典》研究工作。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采纳朱筠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早已失传的珍贵资料；现有《永乐大典》虽仅存当时的百分之二、三，其中仍有许多资料是值得继续发掘的。他深知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分量，一方面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或收购，或传抄，或通过馆际交换，征求摄影本缩微复制；从解放前到建国后几十年中，现存《永乐大典》的绝大多数以各种不同形式的本子，入藏于北京图书馆（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这批《大典》资料，全部都用上了）。另一方面，从三十年代起，在他的倡导下，开始编制《永乐大典》引用书卡片索引，从而开展“辑佚”工作，先后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元一统志》、《析津志》和其他待整编方志、文集多种。

1928年以后，他负责编辑北平图书馆馆刊，从1933年9月起编辑大公报图书副刊，除组织稿件外，自己也经常写些古书题识和书评等文章。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蓄谋将北图珍藏古籍善本盗运走。他为此日夜不安，竭尽心力，设法拖延，终于使国民党当局这一图谋未能得逞。1949年北京解放不久，华北人民政府将八路军战士抢救下来的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所藏金刻藏经四千三百多卷，送到北京，移交北京图书馆保藏。他对此极为感动，亲自撰写说明，举办“赵城金藏”展览，宣扬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化遗产，积极保护文物的政策和精神。他多方设法，从延请技艺精

湛的装裱工，到访求装裱必需的绵纸，为做好赵城藏的装裱整修工作采取种种具体措施，使这部藏经，得以装修复原，延年长存。

建国后，他喜见祖国新生，精神振奋，努力学习，要求进步。对当时政务院公布的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办法，积极拥护。以后在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下，协助郑振铎、王冶秋等领导同志，对各地图书文物的调查、保护和收集、鉴定做了许多工作。如1950年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曾参加华东工作团工作。1963年有位流寓澳门的藏书家，要将他的藏书出售，当时国外觊觎者甚多。文化部得知此讯，立即请他前去鉴定，将这批书及时购回，其中宋刻本八种，元刻本十五种，黄丕烈校跋书八种，还有鲍廷博，陈鱣校本和明铜活字印本，使这样一批珍本免于流佚国外。经他调查并鉴定由港澳收回的珍本古籍，还有好几批。另外，他还尽心竭力或自己出面，或协助馆内同志，征集到许多珍本书和名家手稿；如王国维、梁启超、吴晗等人的手稿、吴梅收藏并校跋的古典戏曲等等。

一九五九年值建国十周年大庆，他主持编定《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将建国以来新入藏大量善本古籍，也包括少部分抗战以后至建国前入藏善本，编成书目八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主编《中国版刻图录》，以图版形式，按版刻时代及雕板地区编排，系统地介绍我国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展，由文物出版社精印出版。以这两部书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1964年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作更加努力，他对北图的善本书藏，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每一部书的整理编目，以至登记、入库、排架，都亲自参与。他对善本的装修，亲自过问并加指点，提出“整旧如旧”原则，力促精益求精；而这一原则，是根据历代书籍装修实例，装修的传统技术提出的。他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一方面现表在对于书

籍的关心备至，一方面着重在专业人员的培养，期望后继有人。从五十年代中期，他在馆内给同志们开课，以目录学为主，先后讲过史料目录学和集部的目录学，系统地讲述历代的史学著作，不同体裁的史书，并结合版本知识，介绍各种史书的版刻源流，现存版本的优劣等等。集部目录学的讲授，大致也是如此。原计划从1966年起，讲授经部目录学，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止。

十年浩劫中，他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以致长期卧病在床。1980年6月，终因病重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赵万里主要著作目录

- 校辑宋金元人词** 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 赵万里主编 1933年刻本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赵万里主编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版刻图录 赵万里主编 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元一统志 校辑 1966年中华书局出版